商周原始瓷装饰纹样略论

郑建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先秦时期的原始瓷,起源于夏代,初步发展并稳定于商代，进一步发展于西周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时期。大致可分为夏商时期(滥觞期)、西周早期(第一个发展时期)、西周中期(相对低谷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二个发展时期)、春秋中晚期(再次衰落期)、战国早期(鼎盛期)及战国中晚期(衰落期)等几个大的时期。而原始瓷装饰纹样的繁简,则与原始瓷发展的起伏相一致。在发展高峰时期,不仅产品种类丰富、胎釉质量高,而且纹样华丽、繁缛,几乎密布于器物全身;在发展低谷时期,则器类单一,器形小,纹样相当简单。

一　商代原始瓷装饰纹样

商代原始瓷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数量并不多,且主要集中于浙江省境内,与浙江邻近的江苏、福建及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诸省亦有少量发现,其中北方地区又以河南省出土的数量较多。商代原始瓷胎釉成熟但不十分稳定,器类少,器形较为单一,纹样亦较为简洁。商代是全国原始瓷个性明显、共性相对较少的时期。商代原始瓷主要可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以河南为代表的北方(主要是中原)地区两个区。此外,以江西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和广东、福建的粤东闽南地区出土有一批带釉的器物,可以划分为另外两个区。

1. 江南地区商代原始瓷装饰纹样

浙江出土的商代原始瓷种类较丰富,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在遗址中存在较为普遍。近年来,不仅发现了随葬原始瓷的商代墓葬,还发现有大规模原始瓷窑址群存在。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以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应该是商代原始瓷生产与使用的中心地区。器类主要有簋、豆、钵、盘、罐、尊、盆等。绝大多数器物为素面,少量器物有装饰纹样,纹样主要有饕餮纹、云雷纹、叶脉纹、斜方格纹、弦纹、镂孔及刻划符号等。装饰技法有刻划、拍印、镂孔等。装饰纹样主要见于商代早中期，商代中晚期较为少见,且年代越早,风格上越是规则整齐,年代越晚则越为粗放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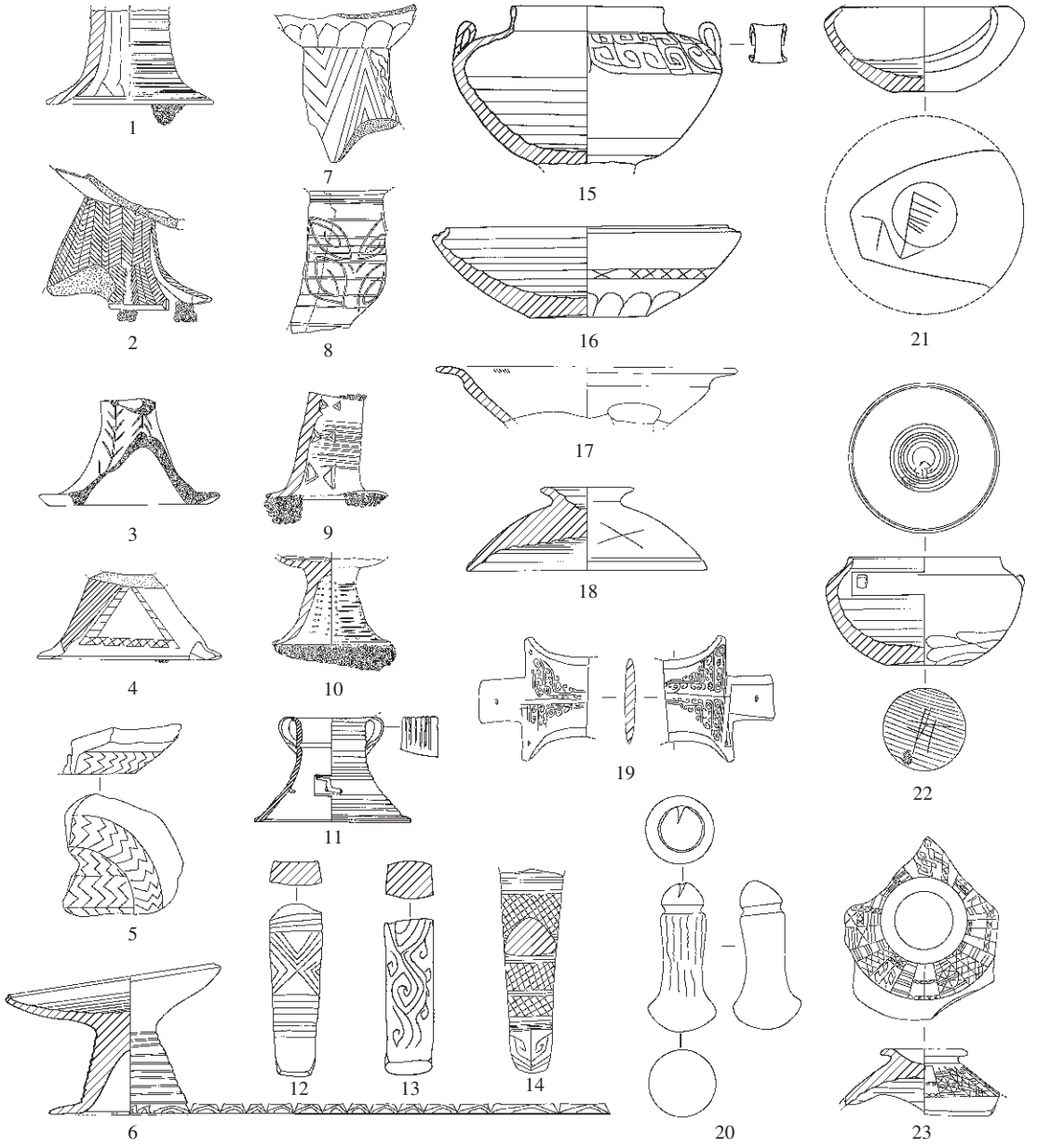
饕餮纹　数量极少。在湖州南山窑址发现 1 件豆,豆柄正中饰有饕餮纹,纹饰简洁粗放，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侧为一条纵向叶脉纹(图一：8)。

云雷纹　连绵勾连,转角较圆,纹样一般较大，均为刻划而成。一般位于罐的肩部(图一：15)、三足盘的足面(图一：13)、戈的正背两面(图一：19)等,其中以三足盘的足面最为常见。

叶脉纹　多位于豆类器物的豆柄外侧，刻划而成。有排列较为规则而繁密的（图一：2），也有刻划较为单一而随意的（图一：3），后者时代一般较晚。

斜方格纹　有两种，一种是刻划斜方格纹，一种是拍印斜方格纹。前者多位于三足盘的足面上，且多与细弦纹甚至云雷纹等其他纹饰组合使用，少见单一刻划斜方格纹的现象（图一：14）；后者则与此地区的传统印纹硬陶技法相似，拍印而成，甚至器形亦与之相同（图五）。

水波纹　一般较为细密规则，多见于豆的柄部或盆类器的底部与腹部（图一：5）。



图一　江南地区商代原始瓷装饰纹样

1. 弦纹　2、3. 叶脉纹　4、16. 斜“十”字形纹　5. 水波纹　6. 近“人”字形纹　7、12. “人”字形纹　8. 饕餮纹　9~11. 镂孔　13、15、19. 云雷纹　14. 斜方格纹　17、18、21、22. 刻划符号　20. 仿生形装饰　23. 复合型几何刻划纹饰

“人”字形纹　多个“人”字上下重叠构成一组，且一般多组并排（图一：7）或相对连绵（图一：12）。

斜“十”字形纹　多个斜“十”字连绵成带状装饰于器物的足部（图一：4）或腹部（图一：16），并与弦纹等纹饰复合使用。

弦纹　除在三足盘足面等与其他纹饰构成复合纹的细弦纹外，还有豆柄上装饰的较为粗犷的弦纹，多圈重叠，并且多与镂孔构成复合纹（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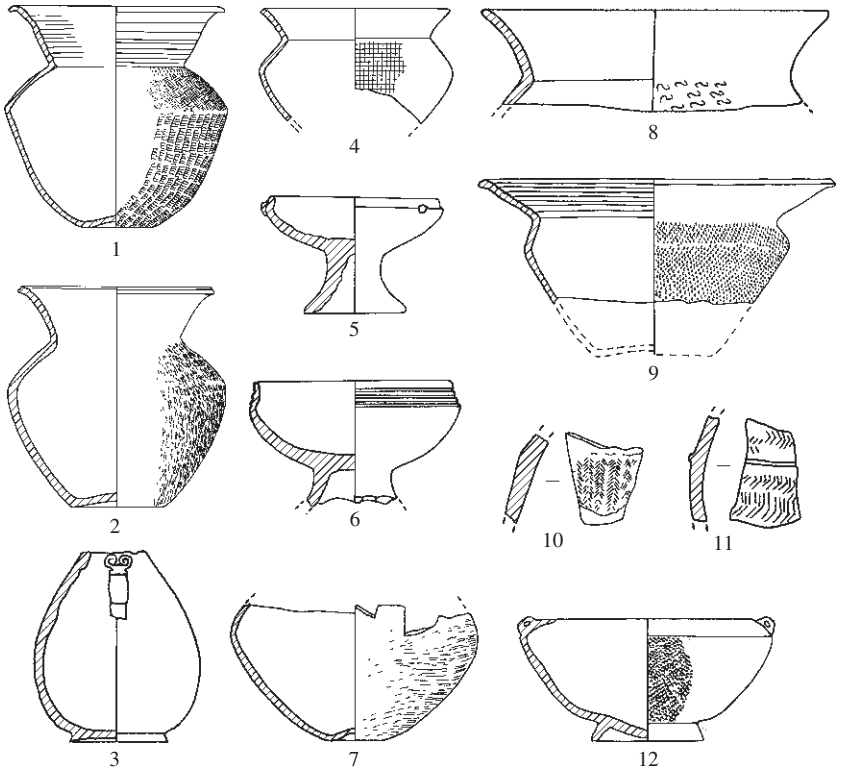
复合型几何刻划纹饰　湖州南山窑址有少量出土。位于较大型器盖的盖面上，以盖纽为中心呈圆环形，再分成若干个扇形等份，扇形内分别刻划细弦纹、“十”字形纹、云雷纹等，且有一定的组合方式，当具有一定的特殊涵义（图一：23）。

其他几何纹饰　豆柄等见有少量连续简洁的几何形纹饰，如近“人”字形纹（图一：6）。

镂孔　数量不多，多位于豆柄上。包括三角形（图一：9）、圆形（图一：10）、Z形（图一：11）等，一般为多个连续成组出现。

刻划符号　夏商之际或商代早期多见于器物口沿上，商代中晚期则多见于器底或盖面上。内容较为简单，包括×形（图一：18）、“井”字形（图一：22）、多条短弧线形（图一：17）和不规则形（图一：21）等。

仿生形装饰　商代原始瓷装饰多为高度几何化的构图，很少见有十分具象的图案。此件祖形瓷垫相当特殊，除作为制瓷工具外，可能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图一：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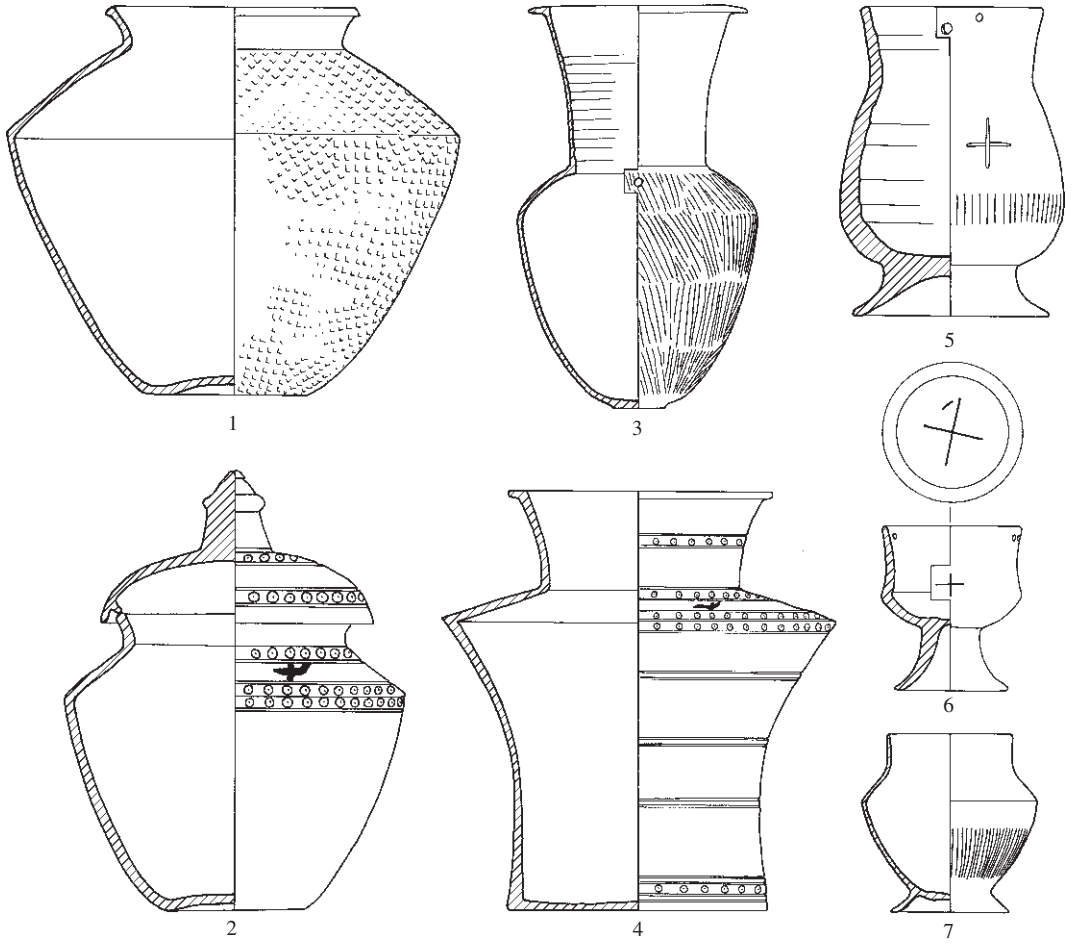
图二　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装饰纹样

1. 席纹与短篮纹复合纹　2. 小竖短篮纹　3. 卷云状耳　4、9、12. 方格纹　5. 扁泥条形耳　6. 弦纹　7. 小横短篮纹　8. 横S形纹　10. “人”字形纹　11. 曲折纹

2. 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装饰纹样

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出土数量极少，且集中出土于大型都城遗址或高等级墓葬中，以商代早、晚期都城郑州商城[1]和安阳殷墟[2]两遗址最为集中。据此，可将北方地区商代原始瓷分为二里岗期与殷墟期两个大的时期。

二里岗期大约相当于商代前期，可进一步分为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两个时期。原始瓷从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出现，数量极少，器类单一，仅有尊类器物。尊为敞口、折肩、凹圜底，按腹部的深浅可分为深腹与浅腹两种类型，一般通体满布纹饰。纹饰主要有席纹与短篮纹复合纹（图二：1）、小竖短篮纹（图二：2）、小横短篮纹（图二：7）、“人”字形纹（图二：10）、横S形纹（图二：8）、方格纹（图二：4、9）、曲折纹（图二：11）、云雷纹等。而器物的口部与内颈则多为密集的细弦纹。



图三　长江中游与粤东闽南地区商代釉陶或原始瓷装饰纹样
1. 方格纹　2、4. 圆圈纹与刻划符号　3、7. 细竖条纹　5、6. 刻划符号

殷墟时期相当于商代晚期。此时期大口尊已基本不见，但器类有所增加，江南地区最为常见的豆与罐均见于殷墟，且胎釉均十分相似。器类主要有豆、罐、尊、瓿等，纹饰大量减少，除少量尊类器物上仍有纹饰外，其余器物基本为素面，偶见极简洁的弦纹、方格纹、S形堆贴、扁泥条形耳等装饰纹样。

弦纹　多位于豆盘口沿下的外腹部，较细密，多道刻划成组（图二：6）。

方格纹　均较细小，装饰于罐或瓿形器，通体拍印（图二：12）。

耳　有两种，均为堆贴。一种呈卷云状，位于壶类器物的上腹部（图二：3）；一种为扁泥条形，位于豆的口沿下（图二：5）。后者无论是器形、胎釉，还是耳的形态、装饰风格，均与江南地区商代晚期的豆十分相似。

3.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釉陶或原始瓷装饰纹样

以江西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釉陶或原始瓷主要出土于吴城文化诸遗址中。一般火候较低，胎色较深，胎质较松，釉呈深褐或酱褐色，釉层厚薄不匀，大多数釉层较薄，只有少数釉层较厚[3]。从吴城文化第三期开始，釉陶或原始瓷器类较为丰富多样，主要有豆、罐、瓮、尊、盆等，少数为素面施釉，多数为釉下饰几何纹，常见有方格纹、锯齿状堆纹、圆圈纹、弦纹、篮纹、S形纹、水波纹、刻划纹、云雷纹、“人”字形纹等[4]。

方格纹　见于瓮与尊等器物上，通体拍印，细密规则。吴城文化的瓮器形较大，敞口，短颈，折肩，深腹，凹圜底（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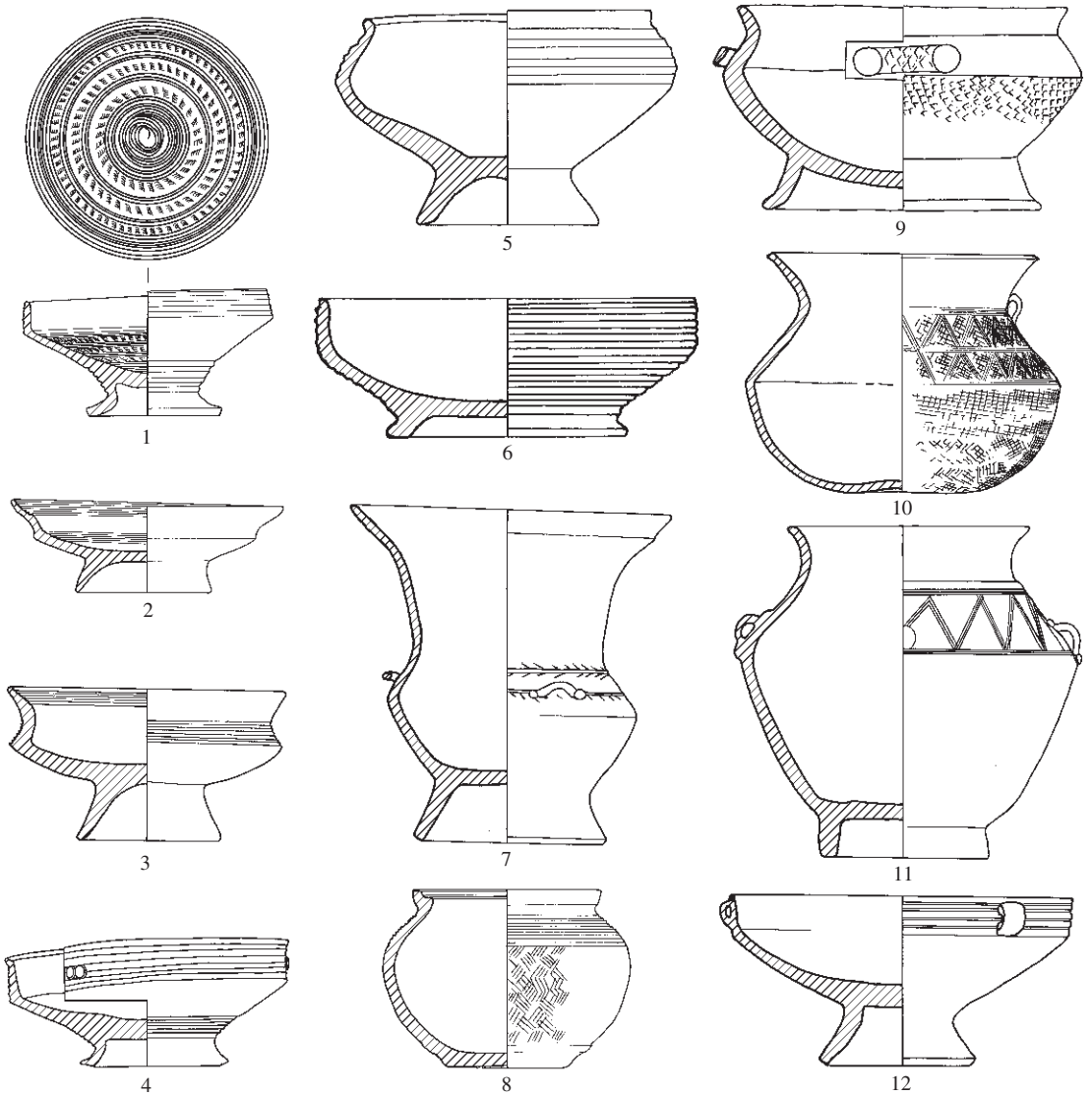
锯齿状纹　多见于深腹瓮或尊类器物的肩部，多道密布，压印堆贴。

圆圈纹　带釉类器物上较为常见的纹饰。见于罐、瓮、尊等大型器物的肩部，以及豆类器物的圈足、器盖的盖面等部分，呈条带状构成连珠纹（图三：2、4）。

刻划符号　吴城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一般较为简洁，可能具有记事、记数等功能，也有人认为是早期的文字。而釉陶或原始瓷上亦发现有一定数量，一般刻划或戳印于器物的沿部、肩部和底部等部分（图三：2、4）。

4. 粤东闽南地区商代釉陶装饰纹样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浮滨文化发现有大量的釉陶，甚至在许多遗址或墓葬中



图四　西周早、中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1. 篦划纹　2、3. 细弦纹　4. 弦纹与小圆形泥饼耳饰　5、6. 弦纹　7. 叶脉纹与小圆形泥饼耳饰　8、10、11. 曲折纹　9. 方格纹与小圆形泥饼耳饰　12. 扁泥条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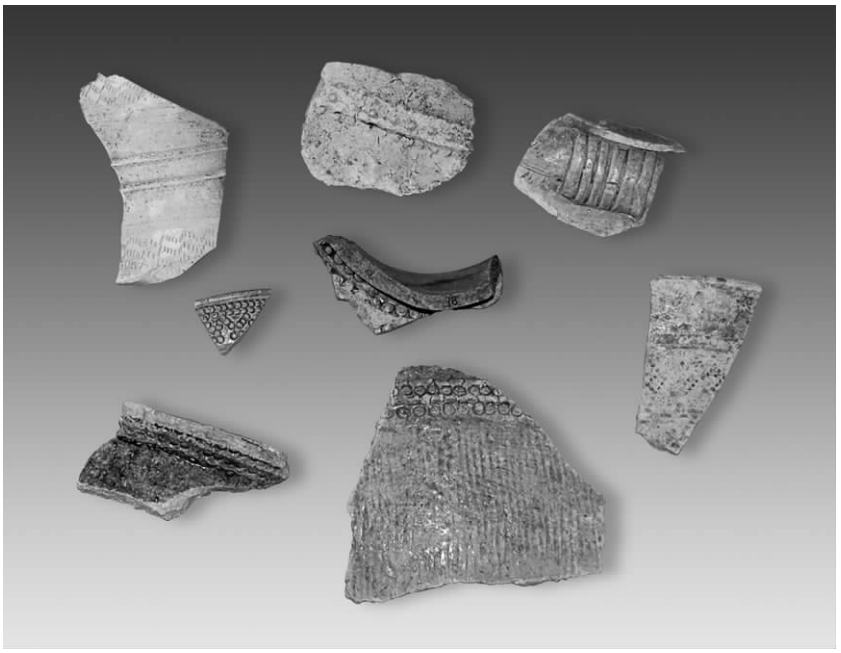
图五　斜方格纹原始瓷罐

所占比例高达一半以上。此种带釉类器物所占比例较高的现象，在商代其他文化中是相当罕见的。浮滨文化的釉陶施釉技术较为成熟，一般在杯、尊等器物的外腹部通体施釉，釉层较厚，施釉均匀，表明其已有相当的技术积淀。但由于火候较低的缘故，釉层玻璃质感不强，玻化程度不高，且釉色多呈深黑、酱色等深色。其与原始瓷的最大差异在于器物的胎质多为土黄色的硬陶质，且较商代原始瓷胎色深，火候低。因此，称之为釉陶是比较合适的。

浮滨文化的釉陶以素面为主，只有少量器物饰有细竖条纹（图三：3、7）、方格纹、复线菱形纹和斜线纹等。但较为突出的是流行刻划符号装饰，主要见于豆盘内外壁、圈足等部位。除“十”、“人”、“二”、“川”等两三个笔画外，还有一些较为复杂的类似人物舞蹈的图案，可能已摆脱了简单记号的范畴，而具有一定的象形符号或文字的功能（图三：5、6）[5]。

二　西周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西周早期原始瓷摆脱了商代胎釉特别是釉不稳定的状态，胎色浅白，胎质细腻坚致，施釉均匀，釉层薄，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釉色青黄，原始瓷的各种性状至此已完全稳定下来。同时，这一时期的原始瓷一改商代区域特征明显的特点，全国大部分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具有趋同的趋势，不仅器形、胎釉较为一致，而且纹饰亦十分接近。从出土区域来看，以浙江及其周边省份出土数量最多，产品质量高，器类丰富，主要包括鼎、豆、罐、盂、尊、壶、盉、盆等礼器，并由此迎来了原始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器形普遍不是很大。这一时期是北方地区在整个先秦时期出土原始瓷数量最多的时期。原始瓷见于大中型墓葬中，凡是出土原始瓷的墓葬均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等器物，因此这一时期的原始瓷在北方地区是作为象征身份与地位的显赫物品使用



图六　闽南地区西周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图七　大曲折纹原始瓷罐

图八　细曲折纹原始瓷簋

图九　斜方格纹原始瓷尊

图一〇　斜方格纹原始瓷簋

的。器类、器形、胎釉及纹饰均与南方的浙江地区十分接近。

伴随着原始瓷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特别是大量礼器的出现，原始瓷装饰纹样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原始瓷普遍见有装饰纹样，几乎不见素面器物，装饰纹样主要有弦纹、篦划纹、叶脉纹、曲折纹、方格纹等，耳流行圆形小泥饼或在小桥形耳两侧贴小泥饼，也有扁泥条形耳。同时，还出现了一部分仿印纹硬陶上席纹的纹饰。

弦纹　大量出现。饰于豆、盂、尊等器物的外腹部，一般线条较粗大，与早期的刻划细弦纹差别比较大（图四：4~6）。

篦划纹　主要见于豆盘的内腹部，多圈盘旋，间以细弦纹，布满整个豆盘内腹，刻划而成（图四：1）。

方格纹　数量较少。拍印或刻划而成，多见于尊类器物的外腹部（图四：9）。

此外，还有少量叶脉纹（图四：7）及曲折纹（图四：10、11），常见于尊等器物的肩部，刻划而成。席纹则见于与印纹硬陶相似的罐类器物上。

这一时期流行小泥饼作为耳饰。豆等小型器物在口沿下上腹部设有多组小圆形泥饼，一般三组等距分布，每组由两个构成（图四：4）；而尊、罐类较大型的器物则在桥形耳的两端各堆贴一小圆形泥饼（图四：7、9）。除小泥饼耳外，还有扁泥条形耳，堆贴于豆类器物的口沿下，一般为三个等距分布，装饰性强而基本不具有实用性（图四：12）。

除以上地区外，南方的闽南等地区还出现一些独具特色的器物，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均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别，流行各种圆点纹或小泥饼构成的连珠纹、篦划纹、弦纹等，一般满布器身（图六）。

三　西周中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西周中期是原始瓷发展相对低潮的时期，西周早期常见的大型礼器此时已基本不见，仅剩豆、碟等少量器物，器类单一，器形矮小，装饰单一，基本仅剩细弦纹一类。在敞口、浅坦腹的豆或碟类器物上一般刻划于内腹部（图四：2），在敞口、折腹的豆类器物上则除了外敞的口沿外，外折的腹部也有刻划（图四：3）。纹饰刻划

图一一　锥刺纹原始瓷罐

图一二　锥形泥点原始瓷尊

图一三　托盘形原始瓷器

图一四　带甑壶形原始瓷器

细密。少量较大型的罐类器物外腹部刻划有曲折纹等纹饰(图四：8)。

四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原始瓷发展的第二大高峰，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礼器重新出现，而且器形更大，造型更丰富，纹饰更复杂。

1. 西周晚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西周晚期原始瓷器类主要有罐、盘、碟、盂、尊等。釉一改西周早中期以来的薄而均匀的状态，演变成黄褐或酱褐色厚釉，不仅釉层厚，而且流釉现象严重，胎釉结合不是十分理想且较容易剥落。

纹饰发达，包括曲折纹、斜方格纹、弦纹、锥刺纹等，满布器身，流行S形堆贴。装饰技法基本为刻划。

曲折纹　有两种：一种是大曲折纹，折线较大而疏朗，见于大型的罐类等器物腹部(图七)；一种是细曲折纹，折线较细密，转折较小，装饰于小型器物上(图八)。

斜方格纹　主题纹饰之一。一般呈条带状装饰于器物的腹部，有单条的，也有多条的。一般见于较大型的器物上(图九、一〇)。

锥刺纹　由数个锥刺点构成短斜直线，两条相对的短直线构成“人”字形纹，多个“人”字形纹组成条带状。一般为多条装饰于器物的肩部、外腹部等(图一一)。

弦纹　最为常见的纹饰。小型器物独立使用，大型器物则多与其他纹饰组合使用。

除上述刻划纹饰外，这一时期还流行堆贴装饰，除偶见锥形泥点(图一二)等外，基本为S形堆贴。西周早期流行的小泥饼装饰在西周中期前后逐渐消失，而代之以S形堆贴，广泛见于各种器物的肩部、宽沿及桥形纽的两侧，在部分器物上甚至成了主题纹饰(图八)。

西周晚期原始瓷除使用大量的纹饰来显示其珍贵和与众不同外，使用大量特殊的造型亦是其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如托盘形器(图一三)、带甑壶形器(图一四)等，为以前诸时期所少见[6]。

2. 春秋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春秋早期原始瓷无论是器类还是装饰纹样均大量增加，器物种类繁多，装饰纷繁复杂。器类主要有鼎、簋、碗、钵、盂、器盖、尊、筒形卣、垂腹卣等，其中各种大型卣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器物均为满釉，施釉不均匀，流釉与缩釉现象严重，釉色较深，釉层较厚，多数玻璃质感较强，釉色较佳，胎釉结合较西周晚期明显进步，剥釉现象减少。釉色较西周晚期

图一五　釉下彩原始瓷镇

图一六　原始瓷尊

变浅，从酱褐或黄褐色变成青黄色。

装饰复杂，除碗外，其余器物包括鼎、簋、钵、盂、尊、卣等器物上均有大量的装饰纹样。装饰纹样有勾连S形纹、双勾线S形纹、双勾线勾连S形纹、双勾线双S形纹、细乱多次拍印的勾连云纹、规则的变体云雷纹、对称弧形纹、圆圈纹、菱形纹、剔刺纹、水波纹等，纹样总体风格粗放杂乱，仅少量双勾线S形纹、双勾线勾连S形纹、云雷纹排列较为整齐有序（图一七）。装饰技法一改西周以前的以刻划为主为以拍印为主，一般一个印模构成一组纹饰，连续拍印，布满器物外腹部。剔刺和刻划也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堆贴S形纹现象较西周晚期明显减少。

S形复合纹　其母题是一个S形纹，一般为三个并列再以一近横向S形相连组成一组并构成一个印模，再在器物腹部连续或重叠拍印，较为杂乱。有单勾线的，也有双勾线的，以拍印为主，偶见刻划的现象。主要见于各种大型的卣类器物上（图一八：1~6）。

对称弧形纹　一般由上下各两道弧形纹构成，五组对称弧形纹构成一个完整的印模，纹饰较为粗大（图一八：13、14）。

水波纹　一般较短而细密，多刻划于碗、钵、盆、小型器盖等日用器上，偶见于簋等礼器上（图一八：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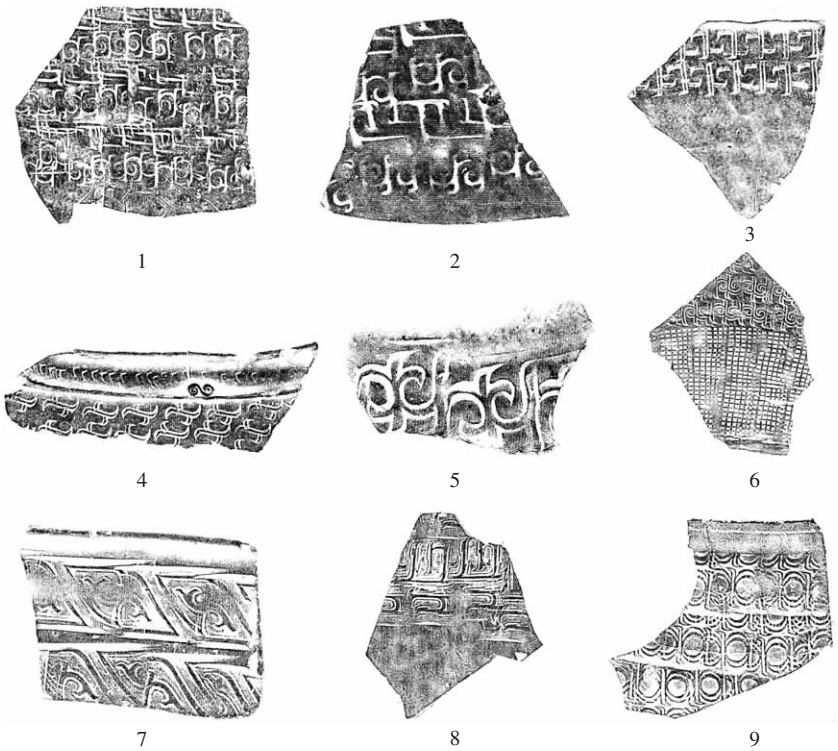
剔刻纹　见于鼎与尊等器物上，包括S形、三角形等内容。S形纹较粗放，剔刻方法有两种：一种由S形自上到下一次刻成，起笔处较浅细，收笔处最深粗；一种从S形的中间向两头分别剔刻，因此在两头积泥形成小的泥点（图一八：16）。两种方法均在表面形成外凸、尖锐的泥点。三角形纹在剔刻的收笔处积泥形成小的泥点。

S形堆贴　这一时期大量减少，仅在少量器物的口沿及肩部保留有这一做法。两个或三个等距分布，不见早期多个密布的现象（图一八：7）。倒U形系或绳索状盖纽，两头往往亦有S形或反S形堆贴（图一八：1、6）。

耳　除桥形耳外，还出现绳索状倒U形耳，紧贴于器身，装饰性多于实用性（图一八：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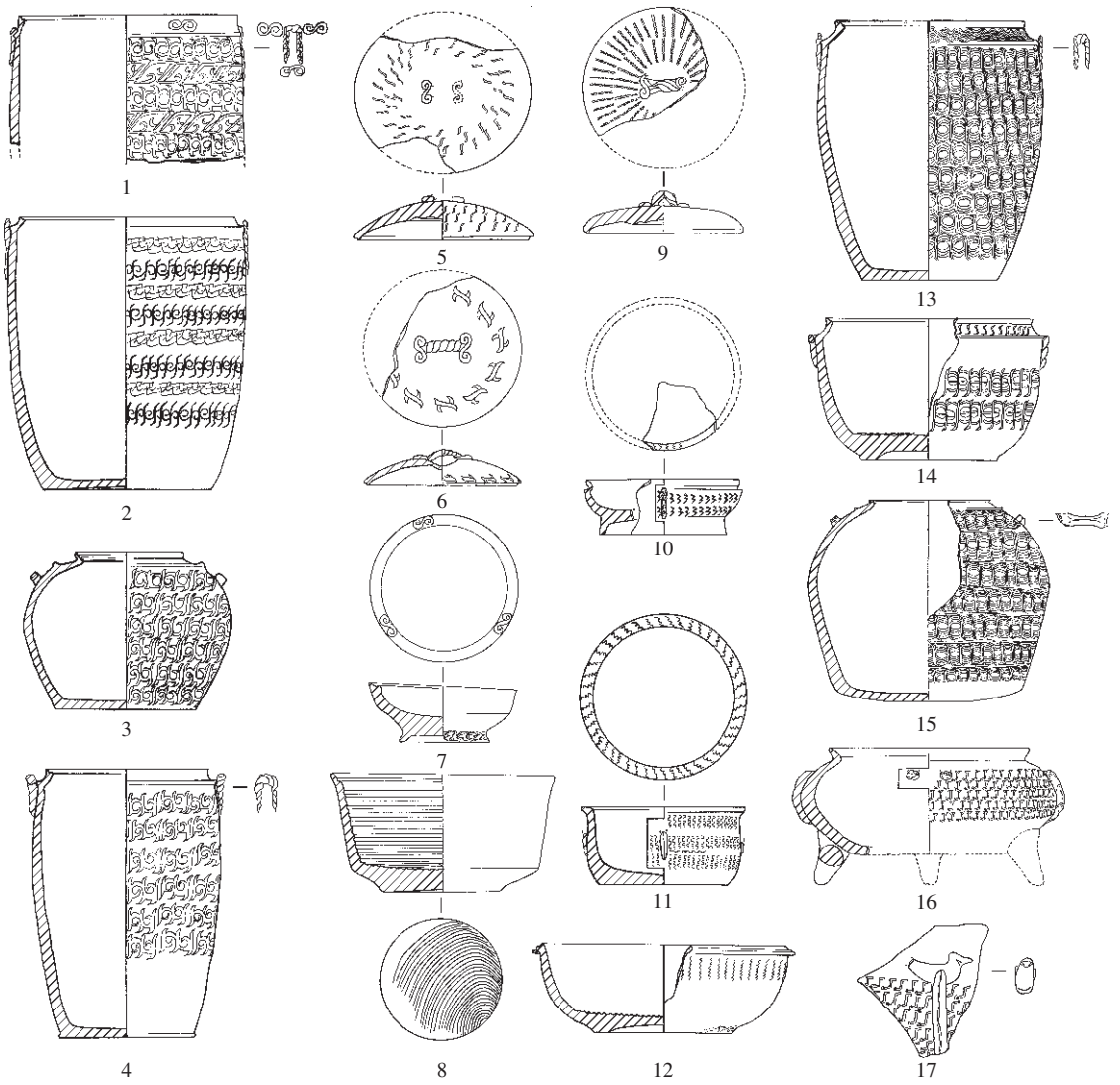
圆雕仿生装饰　仍旧少见，仅在鼎类器物的扉棱上有简洁的立鸟等题材（图一八：17）。

刻划符号　这一时期与西周晚期还普遍流行在器物的底部刻划各种符号，一般较为简单，如各种“↑”、“×”、“═”等。



图一七　春秋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拓片

1、2. 勾连S形纹　3、4. 双勾线S形纹　5. 双勾线勾连S形纹　6. 双勾线勾连S形纹与方格纹　7、8. 变体云雷纹　9. 对称弧形纹



图一八　春秋时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1、6. S形复合纹与S形堆贴　2、3、5. S形复合纹　4. S形复合纹与倒U形耳　7. S形堆贴　8. 细弦纹　9~12. 水波纹　13~15. 对称弧形纹　16. S形刷刻纹　17. 圆雕仿生装饰

五　春秋中晚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春秋中晚期是原始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衰落期。这一时期器类单一，盅式碗占据了绝大多数，另有少量的盘、钵、罐、小罐等器物。但胎釉较前期有明显进步，胎色浅，胎质较为致密、细腻，气孔很少，火候高；均为满釉，釉层薄，施釉均匀，玻璃质感较强，青黄釉色极佳。部分器物出现了窑变现象，积釉较厚处呈乳白色。

基本为素面。在少量器物的口沿饰有细弦纹，盘、碗类器物的弦纹不仅限于底部，而且腹部也常满布，纹路细密，可能已具有装饰功能（图一八：8）。在罐类器物上偶见对称弧形纹与米筛纹。与春秋早期相比，这一时期对称弧形纹的结构与技法基本一致，但更加细密规则（图一八：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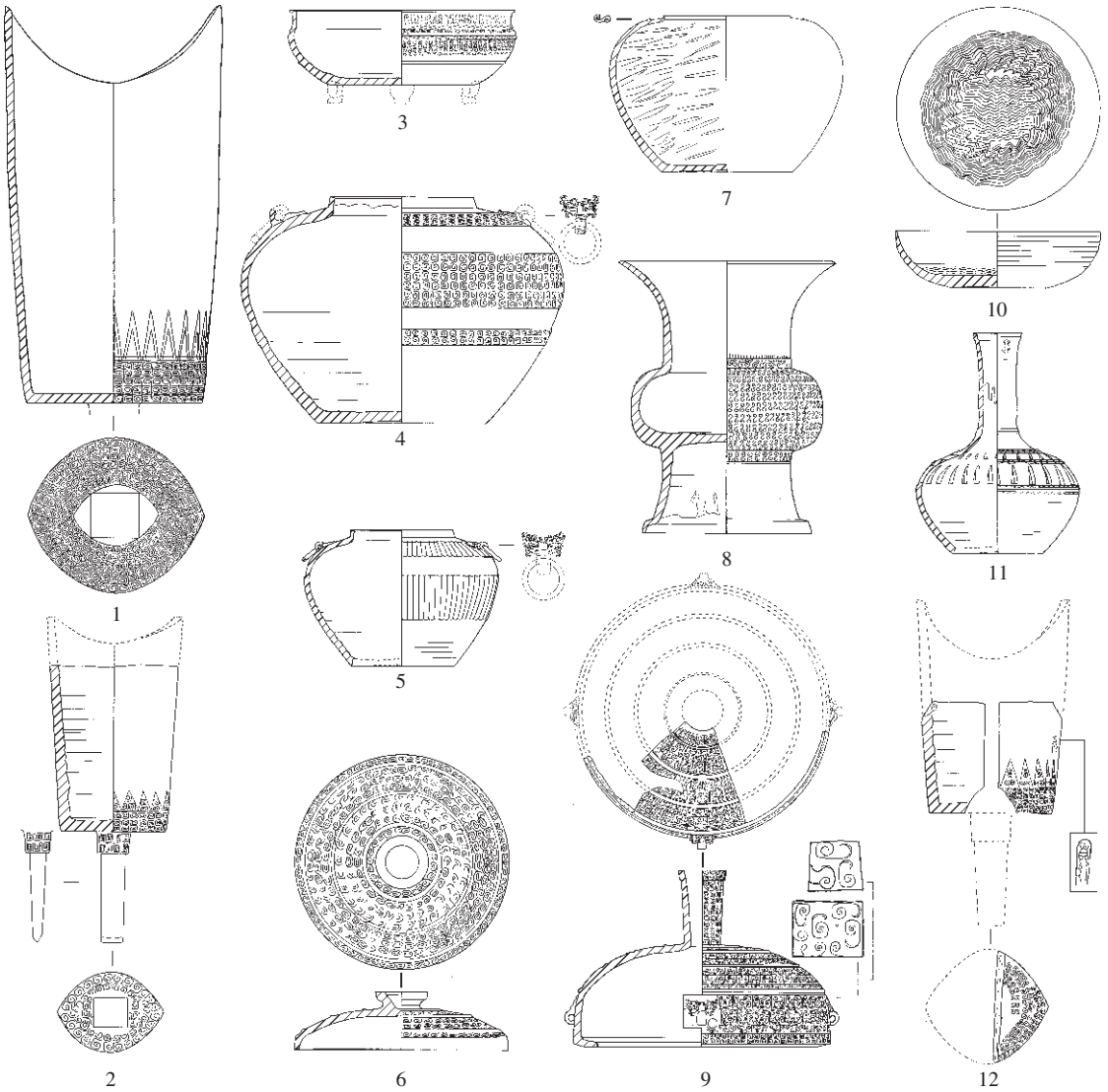
六　战国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随着越国国力的昌盛，原始瓷也在战国早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在胎土洗练、器物成型、施釉、装饰等方面，均达到了鼎盛。器类非

常丰富，包括各种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日用器等，几乎涵盖了青铜器的所有门类，主要有鼎、豆、盘、罐、尊、瓿、钫、冰酒器、温酒器、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盆、鉴、匜、烤炉、镇等礼器，甬钟、镈钟、镎于、钲、句鑃、鼓座、缶等乐器，碗、钵、盂、盘、杯、盅、盏、盒等日用器。许多器物器形巨大，造型复杂，胎釉上乘，装饰华丽，代表了这一时期制瓷发展的最高水平[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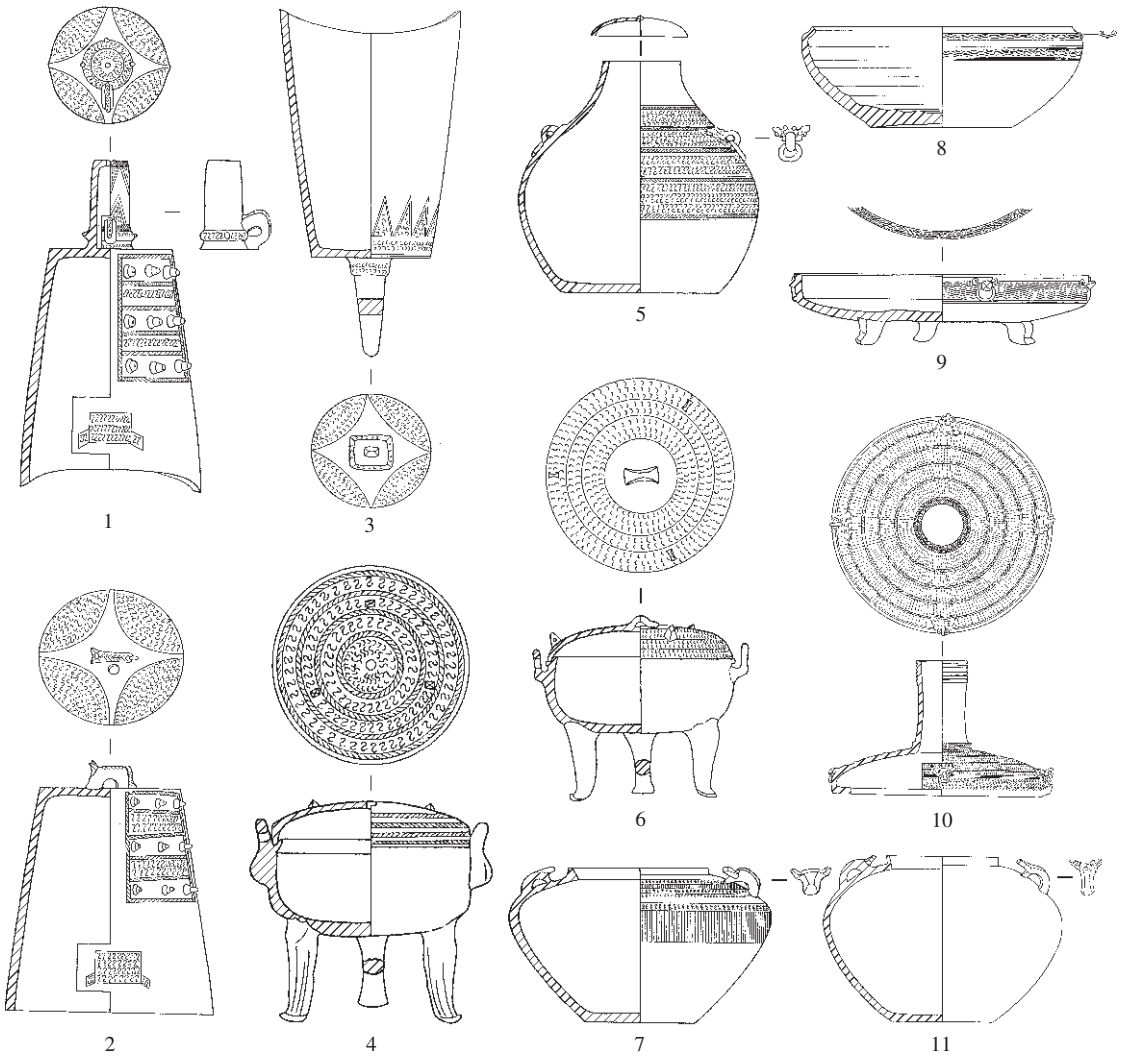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装饰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礼器、乐器及大部分日用器物均有装饰。装饰技法有拍印、堆贴、刻划、修刮等几种，装饰内容以各种云雷纹、变形云雷纹、各式铺首、瓦楞纹等为主，另有少量的小S形堆贴、弦纹、水波纹、蟠螭纹、篦状纹及刻划符号与文字等。

云雷纹　使用最为普遍，见于各种乐器以及罐、盘、镂孔瓶、镇等各种礼器上。拍印细阴线，大多数转角方正，排列整齐，风格庄严（图一九：1~4）。此外还有少量的近S形纹（图一九：8）和



图一九　战国早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1~3. 云雷纹　4. 云雷纹与铺首　5. 瓦楞纹与铺首　6. 卷云纹　7. 小S形堆贴　8. 近S形纹　9. 蟠螭纹　10. 水波纹　11. 刻划叶脉纹　12. 文字



图二〇　战国中晚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1~6. S形纹　7. 瓦楞纹　8. 水波纹　9. 水波纹与铺首　10. 篦点纹　11. 铺首

一定数量不同形态的卷云纹(图一九：6)。

瓦楞纹(直条纹)　见于各种碗、罐、瓿、匜等器物上。器形越大，纹饰线条越粗，鼓起的部分尖锐有力(图一九：5)。

蟠螭纹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仅见于大型的悬鼓座(或器座)上。此类器物可能用于编钟等成组乐器架子的底座或悬鼓的底座，因此器形巨大厚重。通体饰有纹饰，除高耸的管子与足端外，通体拍印蟠螭纹，结构基本一致，构图有细微差别(图一九：9)。

铺首　普遍见于各种罐、瓿等器物的肩部，悬鼓座、盆类器物的腹部，匜与流相对的一侧，另见于部分盘的腹部。铺首的形态较为复杂：平面近似于倒梯形，刻划细致具体，近方形眼，眼角上卷，眼上为上卷的眉与角，眼下两侧为下卷的獠牙，半环形兽鼻高耸，多衔活环。平贴，略凸起于器表。鼻与兽面分段拼接，先鼻后面(图一九：4、5)。

堆贴　见于较小型的罐、钵、盆、匜等器物上，多呈小S形，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S形堆贴更细长(图一九：7)。

水波纹、弦纹和篦状纹数量不多，均使用刻划技法。水波纹主要见于盆类器物腹部和部分碗的内底(图一九：10)，弦纹则集中于部分碗的

腹部，篦状纹则多为简化铺首的地纹。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少量釉下彩、刻划、文字等装饰。釉下彩为填彩，先在器物上刮出一道凹槽，然后填彩，最后施釉（图一五）。刻划多为“↑”等简单符号，也有近似于叶脉纹者（图一九：11）。在亭子桥的一件句镬上发现有文字（图一九：12）。

七　战国中晚期原始瓷装饰纹样

随着越国国力的衰落，原始瓷也逐渐走向衰微。虽然这一时期保持了战国早期的大多数器类，但器形变小，胎釉质量下降，装饰亦随之简化。

装饰仍较为普遍，广泛见于各种礼器、乐器及日用器物上，但早期规整、庄重的云雷纹完全不见，代之由正反C形构成的S形纹、篦点纹、水波纹与简化铺首等。

S形纹　最为常见的纹饰，通常由正反两个C形构成S形或反S形。早期C形圆弧较大，甚至呈圆形（图二〇：1~5）；晚期逐渐变直呈长弧形，并连续承接成近水波纹形（图二〇：6）。

水波纹　常见纹饰之一，主要见于钵、盘、盆等礼器上，纹饰细密（图二〇：8、9）。

篦点纹　可能由水波纹或S形纹退化而来，点较长（图二〇：10）。

铺首　伴随着器形的退化与其他纹饰的简化，铺首也严重简化，不见早期的刻划形象、复杂造型，代之以更粗放简单的造型，并隆起于器物表面（图二〇：11），甚至简化成仅剩上勾卷的角、鼻及环（图二〇：9）。

瓦楞纹　主要见于罐、瓿等器物上，纹路普遍较窄，不见早期尖锐的鼓起线条[9]（图二〇：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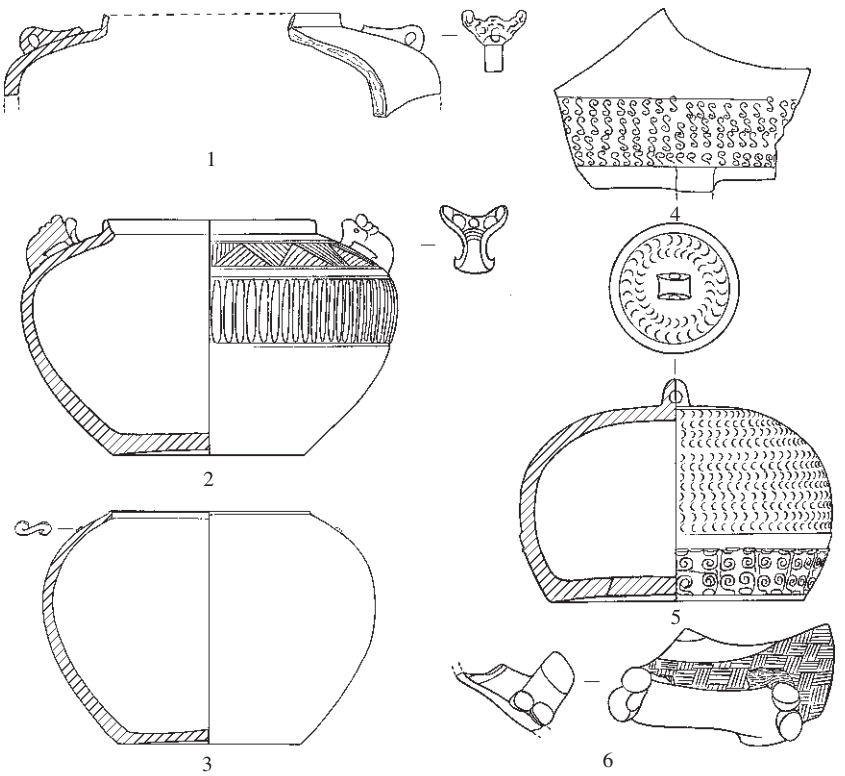
八　江南地区商周原始瓷装饰纹样相关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南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出土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地域分布广泛，出现时间早且序列完整，因此以此地区为核心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

1. 原始瓷纹样的延续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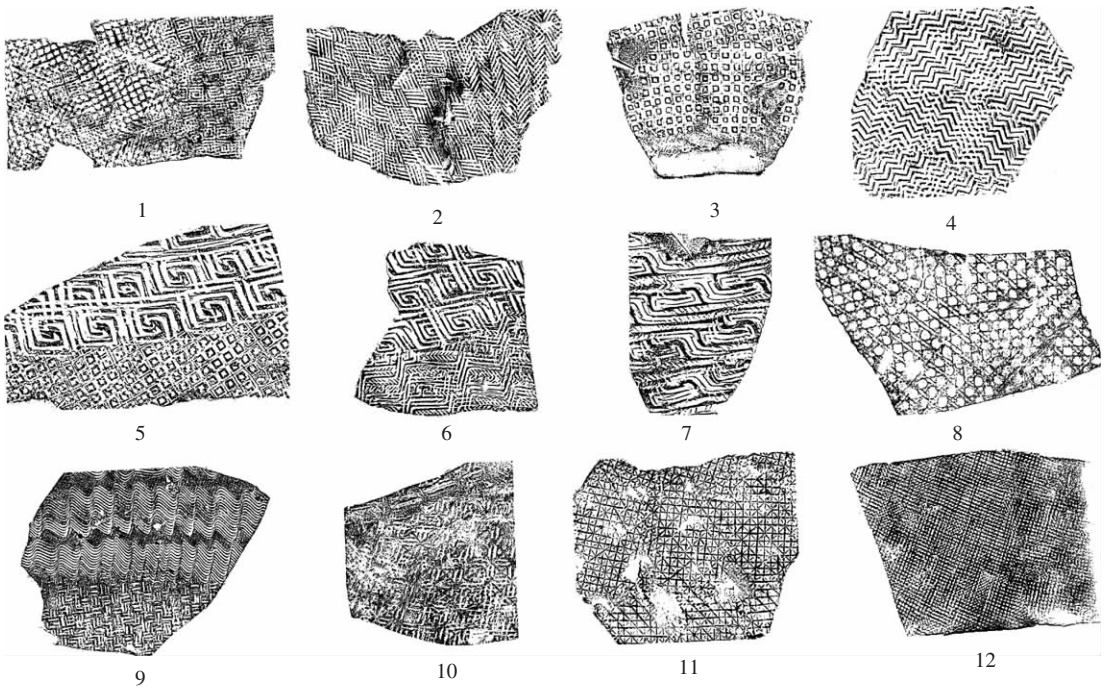
商周原始瓷装饰纹样阶段性特征明显，但至少有几种纹饰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西周春秋时期的小泥饼与S形堆贴、战国时期的云雷纹与S形纹、战国时期各种形态的铺首。

小泥饼与S形堆贴　圆形小泥饼大量流行于西周早期，中期减少，晚期基本不见。一般为两个并列构成一组，多位于器物的口沿下。西周中期前后被S形堆贴所取代，S形堆贴多横置于器物的肩部与口沿等，纹饰紧



图二一　商周时期印纹硬陶与原始瓷装饰纹样

1、2. 铺首　3. S形堆贴　4. S形纹　5. S形纹与云雷纹　6. 小泥饼



图二二　江南地区夏商周时期硬陶印纹拓片

1. 方格纹　2、9. 席纹　3. “回”字纹　4. 曲折纹　5~7. 变形云雷纹　8. 米筛纹　10. 重“回”字“十”字交叉纹　11. “米”字纹　12. 细方格纹

卷，与泥饼较为相似，春秋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小泥饼在江南地区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印纹硬陶上，既有位于罐类器物肩部的，也有位于泥条形耳两侧的，数量不多，但其做法与西周时期原始瓷上的泥饼几乎一致（图二一：6）。S形堆贴在战国时期又重新出现，但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S形堆贴差别比较大。战国时期的S形堆贴形体瘦长，勾卷疏朗（图二一：3），此类纹饰应该与春秋时期的S形纹关系不大，而更接近于同一时期的拍印细阴线S形纹（图二一：4）。

云雷纹与S形纹　云雷纹向S形纹的演变发生在战国时期。战国早期流行云雷纹装饰，各种器物主要是礼乐器上大量使用，纹饰较为复杂，多层圆转（图一九：1）；后线条逐渐疏展拉长，简化成S形纹（图二一：4）。S形纹又发展成中间断开，变成由两个正反的C形构成的S形纹（图二〇：5）。在部分器物上，此种S形纹与云雷纹共存，很好地反映了两者的过渡状态（图二一：5）。S形纹中的C形到战国晚期弧度变小，拉长成新月形，并且不再严格遵守正反两个组成S形纹的构图（图二〇：6），部分同一方向连续延长成近水波纹形（图二〇：7），甚至变成连续的短直线（图二〇：10）。

铺首　铺首的变化几乎与云雷纹同步，也在战国时期逐步简化。战国早期铺首最为复杂具体，纹饰模印，紧贴于器表（图一九：5）；后兽面逐渐简化，不见刻划兽面具体的眼、鼻等器官，并较高隆起于器物表面（图二一：1）；到晚期兽面完全简化，高耸于器表，几乎达到了口沿的高度（图二一：2），在一些较为小型的器物上出现了高度简化的图案（图二〇：9）。

但除以上这几种纹样之外，原始瓷更多主体纹样至少现在看来阶段性特征超过延续性特征，商代的各种刻划几何纹与饕餮纹、西周早期的篦划纹、西周晚期的斜方格纹、春秋早期的各种勾连S形纹与变体云雷纹、战国时期的云雷纹等纹样之间都缺乏前后演变的证据，各自独立起源的可能性更大。

2. 原始瓷纹样与硬陶印纹的关系

此地区硬陶上的拍印纹样出现得相当早，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萌芽;夏商时期广泛流行,主要纹样有云雷纹、方格纹(图二二:1)、叶脉纹、席纹(图二二:2)、长方格纹、菱形纹、短直条纹等;西周时期主要是各种"回"字纹(图二二:3)与曲折纹(图二二:4),西周早中期还流行各种大型的变形云雷纹(图二二:5~7)及各种组合纹样,且出现各种大型的礼器,是印纹硬陶发展的高峰时期;春秋时期纹样简化,主要是各种排列整齐的米筛纹(图二二:8)、席纹(图二二:9)、重"回"字"十"字交叉纹(图二二:10)等;战国时期纹样更简单,以"米"字纹(图二二:11)与细方格纹(图二二:12)占绝大多数。

从各个时期硬陶上的印纹来看,除少量原始瓷偶尔出现席纹、米筛纹、细方格纹等硬陶上常见的纹样外,两者的装饰纹样完全属于不同系统而各自独立发展。由此可以确定,原始瓷从一出现即作为与印纹硬陶完全有别的器物类型而存在,并沿着自身独特的轨迹发展。

3. 原始瓷纹样与青铜器纹样的关系

浙江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数量极少,但江南地区北部安徽屯溪、江苏镇江一带的墓葬中出土有数量不少的青铜器[10]。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原始瓷与青铜器在战国之前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均差别极大。两者第一次交集约发生在春秋早期,少量器物如鼎、簋、尊等礼器在器形、纹饰上均较为接近,如屯溪M5出土的青铜尊与德清皇坟堆原始瓷尊(图一六)[11]器形已非常接近,纹饰亦有几分相似。青铜尊上的棘刺纹亦是春秋早期原始瓷鼎、尊类器物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但两者的纹样内容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原始瓷与青铜器部分器物已有几分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至于谁仿谁的问题,殊难判定,因为与原始瓷接近的青铜器,均具有明显的本地文化特征。作为本地区最具特征的原始瓷,不仅使用广泛,而且渊源有自,不排除青铜器仿原始瓷的可能性。

进入战国时期,大量原始瓷礼器与乐器在器形上几乎与青铜器完全一致,装饰纹样上亦有许多相似之处。战国之前,作为礼制最重要的物化形态之一的乐器,主要由青铜器与石器构成,西周以来甬钟等的使用逐渐制度化,开始成套编组出现。而原始瓷乐器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但种类丰富,且成组成套使用,使用相当成熟。之前毫无乐器制作基础的原始瓷,其乐器的出现显然是受青铜器的影响。战国初期原始瓷上大量使用的云雷纹也脱胎于青铜器上的同类纹样,但在战国中晚期后它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而与青铜器上的纹样逐渐分野,演变成S形纹等独特的纹样[12]。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4] 周广明《吴城遗址原始瓷分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鸟仑尾与狗头山》,科学出版社,2004年。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独仓山与南王山》,科学出版社,2007年。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文物出版社,2008年。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亭子桥》,文物出版社,2011年。

[9]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11] 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瓷器》,《文物》1982年第4期。

[12] 原始瓷与印纹硬陶、青铜器的关系,是原始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是短短几句话能讲清楚的,此处仅点到为止。

(责任编辑:周艳明)